

LINGNAN WENLUN · LINGNAN WENLUN

岭南文论

(第二辑)

吴宏聪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I 206
714
2

阅 览

岭南文论

(第二辑)

吴宏聪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广州

(粤)新登字09号

责任编辑：江 关

责任校对：羊 君

责任印制：蔡杰生

装帧设计：陈智慧

岭南文论（第二辑）

吴宏聪 主编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高发印务公司电脑排版

广州市龙湖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8.8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61-1933-X/I·133

定价：22.50元

主编 吴宏聪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叔成 李鸿生 陈其光

张 绰 张德昌 吴宏聪

胡经之 龚剑祥 曾扬华

管 林 谭志图



目 录

历史与文学的交汇点	曹础基 (1)
“内”“外”之辨	
——兼论中外有关文学特质的见解	刘叔成 (11)
中国古代生命美学初探	余福智 (20)
东西方古典戏剧理论着重点的差异	
..... 潘翠菁 吴文辉 (29)	
西方“表现自我”文学思潮探源	郭正元 (40)
是西方纯粹美学民族化还是中西美学结合的产物	
——王国维《境界论》初探	
..... 封祖盛 唐小华 (53)	
冲突性在中西悲剧的表现及其根源探讨	
..... 徐顺生 (66)	
审美文化及其社会心理分析	刘伟林 (76)
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及其运作	陆 环 (82)
审美角度与美的审视点	伍夫楹 (90)
“不平则鸣”三论	柯汉琳 (100)
评《中国文学理论》	毛庆耆 谭志图 (107)
盘古神话探源	韩湖初 (118)
一笔写两面	
——中国小说人物描写方法论之一	余庆安 (125)



晚明小品的接受历史	吴承学 (128)
中国古代俗文学与雅文学之互补关系 ...	董上德 (139)
论《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及艺术特色	曾宪就 (148)
略论白居易的格诗	张德昌 (157)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争议的由来 ——兼论其诗的艺术风貌	李克和 (166)
王粲登楼与登楼怀乡的传统 ——《登楼赋》文学美学价值之新认识	赵松元 (173)
论陆游的《入蜀记》	梁鉴江 (180)
关羽与“义”	曾杨华 (187)
荆棘丛中的灵肉自适 ——论袁宏道的世界感与幸福观	沈金浩 (194)
屈大均杂体诗初探	林举英 (205)
广东近代文学略论	钟贤培 (216)
郑观应道号及学道始年考	邓景滨 (227)
志澳门风土 抒遗老情怀 ——汪兆镛《澳门杂诗》论略	陈业东 (232)
论龚自珍的创作心理及其风格	吴锦润 (237)
离枝的瑰丽 恋根的缱绻 ——龚诗“落花”的文化意蕴	梁文宁 (245)
近代岭南女诗人范萸香	管林 (252)
略论苏曼殊及其小说创作	陈永标 (257)
黄节的诗歌宗趣及其文学史意义	左鹏军 (267)

康有为的诗文：改革家的忧思与情怀	… 谢飘云 (275)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 程文超 (284)
现代通俗小说的嬗变	… 彭 康 (295)
论胡适“五四”时期的反“载道”	… 钟军红 (305)
冰心·丁玲·张爱玲	
——“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 姚玳玫 (314)
张爱玲和市民文学	… 黄修己 (326)
沈从文的乡土情结	
——读《边城》和《长河》	… 吴宏聪 (335)
作为抒情现实主义作家的汪曾祺	
——汪曾祺文学创作观片论	… 杨鼎川 (345)
中国当代文学论争焦点	… 黄伟宗 (355)
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的创作趋向	… 张振金 (364)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流向	… 关 仪 (370)
人格高尚 文品斐然	
——《秦牧全集》编后	… 陈其光 (375)
岭海纵横数风流	
——漫话岭南文化，兼评《穿过林子便是海》	
……	… 许翼心 (380)
表现欲望 守护诗情	
——当前广东作家的一种创作选择	… 钟晓毅 (389)
赏心悦目 美不胜收	
——读柯岩的《他乡明月》	… 赵士聪 (396)
余松岩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	… 邝邦洪 (404)

建筑在传统文化上的青春型长诗	
——评郭光豹叙事长诗《望乡风》	郑明标 (412)
独特的南国都市风云图	
——重读《三家巷》	黄树红 (424)
迷惘·寻找·象征	
——浅谈近期西藏小说	罗嘉慧 (432)
澳洲华文文学透视	张 焯 (441)
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	
——《三国演义》在泰国	饶芃子 (453)
盛开在佛教王国华文艺苑上的鲜葩	
——八十年代泰华短篇小说扫描	赖伯疆 (461)
论洛夫的《灵河》与《石室之死亡》	
——兼论现代诗的“晦涩问题”	邓国伟 (470)
论牟天磊	王首程 (479)
传统诗艺与现代诗艺的统一	
——评香港诗人戴天的诗	蒲丽钿 (487)
后记	(494)

历史与文学的交汇点

曹础基

在谈什么是文学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往往都会把历史与文学加以区分。历史与文学的分别在哪里呢？前人的论述，大体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1. 在内容上说，历史家写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而文学家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应当发生的事或希望发生的事。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

历史家有义务，只写真正发生过的事迹，并且按照它们真正发生的样子去写；诗人写事物，并不是按照它们实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它们所应当有的样子去写，以便教导读者了解生活。^[2]

剧作家并不是历史家；他的人物不是叙述人们从前相信曾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使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再现；让它再现，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的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要迷惑我们，从而感动我们。^[3]

历史的规律，同小说的规律不一样，不是以一个美好的理想作为目标。历史所记载的是，或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小说却应该描写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一个世纪最杰出思想家

之一奈克尔夫人说。^[4]

2. 在写作方法上，历史家用的是叙述，文学家用的是描绘，一是记录，一是塑造形象。

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5]

应当描写，应当用形象来影响读者的想象力，而不要作记录。叙述不是描绘。思想和音响必须化为形象。^[6]

我们要求作家把它头脑中所想到的东西描绘出来，而不是叙述出来。^[7]

3. 在美学上，历史家在求真，文学家在求美。

史学家的方向，追求的是真与善，文学家追求的是美与善；史学家偏向真，文学家偏向美。^[8]

上述三方面的区别，根本在于两者的写作目的有不同。正如金圣叹所说的：“《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置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9]历史家和文学家都写事、都以文来表达，但历史家目的在“事”，文学家的目的在“文”。然后才是手法不同，一在“运”，一在“生”。

两者在理论上的区别，看来古今中外都是认同的，但在作品的分析与评价上，往往又把历史与文学相混淆。如说司马迁是历史家，也是文学家。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常常将《左传》《国策》《史记》乃至《国语》《汉书》等列为文学作品来讲。

在古代，理论家们也注意到甚至强调《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的文彩，但他们的评价都把它们看作是历史著作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先看看刘知几对《左传》的评价：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谄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

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淋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倖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10]

这可说是古人对《左传》的文学性的最高评价。但刘氏的《史通》正是一本在理论上提出文、史不同标准的史学论著，他在肯定《左传》的文彩的同时，也肯定了《左传》是一本标准的历史著作，“每代国史”，“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不仅《左传》，《战国策》和《史记》也同样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战国策》“长于细节描绘”，“以传神的形态描绘，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11]

“史迁写留侯事，颇多怪迹：仓海、黄石、赤松、四皓，后之论者均断定都无此人。不过迁性好奇，特点缀神异，以为行文之别派。按此实为后世小说滥觞。唐人《虬髯》、《红拂》盖本此义，以为无中生有者。又程婴、杵臼存赵氏孤儿事，《史记》以前古书今有存者，皆无传焉。或意当时汉臣世家中，必有阴谋隐事，类此所记者，迁不便记明言，因托晋卿以影射之，特留一重公案，动异时感吊耳。菽园按：此段更奇，果如或之意拟，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12]

“《史记》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从主要篇幅——传记部分来看，它不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富有文彩的历史），而是历史文学。它可说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清史演义》一类作品的先驱。……传记中的文学作品竟逾三分之二。”^[13]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开‘历史文学’之端，《史记》集其大成。”^[14]

综上所述，《左传》《战国策》《史记》等著作，它们不仅是

历史著作，而且是文学作品。更有甚者，认为它们是不太够格的历史，反而是真正的文学。这样的一些观点，与我们开头所引述的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区别的理论，是不是相矛盾呢？究竟是理论上有所缺陷，还是在这些著作的评价上存在问题？

在我国古代，不仅文学作品，大量的历史著作、理论著作以及一切实用文学，都富有文彩。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在圣人的影响下，作者们都自觉地重视文彩。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说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我们看看诸子之作、看看历代的书信、乃至公文诏书，莫不词藻斐然。而其中历史著作尤为突出。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史的作者不但注重文彩，史作还重视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这与孔子的主张大概也有直接的关系。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5]这影响了历史著作的作者追求具体描述。本来《春秋》以前的史书，多为简约的谱牒、记年。《左传》之后，则不厌其详。

追求具体细节的结果，必然会进而产生虚构。如《文心雕龙·史传》说的一样：“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钱钟书先生也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16]故孟子辟“好事者”，王充著《书虚》，对不实之辞加以揭露、批评。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有“古书多造作故事”篇，把这看作是古书的普遍现象，余氏偏重诸子之作，但史书亦多见其例。且

子书造于前，史家采于后，往往有之。讲究文彩修辞，追求事件细节，加之传闻虚构，因而在历史著作中，类乎文学者多。建安至于南朝，文学自觉，昭明太子，不选史入文。刘宋元嘉十五年在儒学之外，再立玄学、史学、文学，以四学开馆授徒。^[17]尽管所设文学，与今天所说的纯文学有所差异，但毕竟与哲学、史学分开。既体现了文学的自觉，也体现了史学的自觉。在《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对史作中不实乌有的批评，也看到了文史的分野。到了唐刘知几的《史通》更从理论上系统、细致地辩清了文史的界限，说明文笔与史笔的不同。犹文论之有《文心雕龙》，史论有了《史通》。文学与史学的自觉，大体是同步的。在《史通》以后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就比较少能看到像以前那样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了。

我国古代的历史有文学化的倾向，而文学也有历史化的倾向。历史的文学化可从《尚书》的《金縢》算起，而文学的历史化即可从《诗经》乃至神话算起。关于尧、舜、禹等神话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传说，《诗经》的《生民》、《绵》、《公刘》、《大明》、《武》、《正月》、《十月之交》等就是用诗歌写成的周民族的历史。无怪乎后人说“六经皆史”。我们翻开《文选》，不管哪一种体裁的，历史的题材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诗歌中有大量的咏史怀古之作。“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18]不少小说就以“史”“演义”“传”命名的，故被称为“正史之余”，^[19]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戏剧方面，有人统计过，“《曲海总目提要》共收集古今杂剧、传奇曲目六百九十种。作一大概统计，其中历史题材的作品总共三百余种，约占曲目总数的46%。”^[20]

我们可以说，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历史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正如昭明太子在《文选序》中所说的“盖踵其事而增

华，变其本而加厉”，确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

在内容题材上如此，在表现形式上也如此。故事情节在小说、戏剧中所占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没有了故事情节几乎就没有了文学。像外国文学那样的大段心理描绘，是很少见的。而且故事情节多以白描为主，细节也相对没有那么细密。以“传”“演义”为名的，体裁更类于史。从话本、历史章回小说的形成，可以看到由史而文学创作的“踵事增华”的渐变过程。

为什么古代文学会出现这样强烈的历史化倾向呢？

根本的原因似乎要追溯到中国社会的血缘纽带，这是我国社会、我国历史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的纲，社会结构、制度法规、人伦礼节等固然受制于它，文化艺术也不出其外。文化上的崇古、征圣，只不过是祖先崇拜的延伸而已。《诗经》之《颂》，表现了对先祖圣贤无限的顶礼膜拜。屈原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失败之后，内心矛盾苦闷而不得其解时，也首先想到“就重华而陈辞”。经过一番历史的参照之后，才觉得“耿吾既得此中正”^[21]。孔子“好古”“从周”；墨子提出立言的三条准则，第一条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庄子在写作上亦多用“重言”“寓言”，借助前圣代言。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倡导“宗经”“征圣”，成了文学创作的一大原则。所以从历史上取材，最便符合这种要求。

当然不仅在中国，外国也有同样的倾向。“历史题材优越”，是黑格尔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说为：

诗人，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特别爱从过去时代取材。……这样向过去倒退，有一种很大的方便，这就是由记忆而跳开现时的直接性，就可以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比材料的概括化。^[22]

吴秀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引用了黑格尔这一观点后，阐述了

历史文学比之一般现实题材文学的优越性，突出的有三点：

第一是知名度高。“历史文学所用的人事愈著名，它‘在读者的脑里，大约已经是有一半是建筑好了的，作家只须再加上一点修饰，就可以成立，并且可以很有力的表现出来。……作者就能给读者一个很深的印象’^[23]而这一点，恰恰是一般现代题材所无法获惠的。”

第二，可辨性强。由于历史文学具有这样远距离照观的特点，所以一般地说，它对描写对象的感知、评判，在准确性和清晰度方面，比之现实题材常常显示出得天独厚的优越之处。

第三，哲理值重。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廉颇的负荆请罪，这些千古流传不衰的历史事实，它们本身容涵着多少丰富沉积的历史哲理。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历代文人作者为避免文祸，不便直逆龙鳞，而借古以讽今。

历史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历史化，这种相向的转化，在两者之间，就必然存在交汇点。也就是说，会存在同一作品，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现象。别林斯基说过：

只有在历史中，科学和艺术才会汇合在一起，来达到同一个目的，因为在我们今天，历史按其内在内容来说，是学术性的，同时，按其叙述手法来说，又是艺术性的作品。^[24]
《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文学性较强的篇章则属于此。

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一些理论家关于历史与文学区分的论述。其实有些是可以斟酌的。比如“已发生的事”与“可能发生的事”，只能从总体倾向而言，不能绝对化。“可能发生的事”有可能就“已经发生”了。文学家根据“已经发生的”来表现“希望发生的”，同样是符合“艺术真实”的。现实中就存在千奇百怪、曲折动人的故事，只要如实地写下来，就成为艺术的情节。古代的传记与当前的名人传记之所以那么吸引读者，不是没有道理

的。

还有一种情况，一个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的细节是否虚构，读者是很难从“已经发生”与“可能发生”来加以判断的。狄德罗在《波滂的两个朋友》中说过：

历史小说家怎样才能把你骗过去呢？办法是这样：他在故事里穿插一些小情境，紧密地切合题旨，既简单自然，而又难以想象，逼得你不得不在心里赞叹说：“我的天，多真实！他所说的这些事真不是捏造的”。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他避免了修词和诗的夸张，自然的真实才把艺术的权威掩护住；他才同时满足两个像是彼此相反的条件：既是历史家又是诗人，既是真话又是谎话。

像这样的历史小说，说它是文学或者说它是历史都是可以的。

至于历史的细节虚构问题，可能也要从不同的历史体裁来分别看待。这种细节描写，往往只用在人物传记上。《左传》《战国策》与《史记》等，大体上是实录，但也有不少细节不可能证实其是否“已经发生”的。而提出严格区分史笔与文笔的刘知几，还是肯定它们是史家的典范。所以有人认为对这样的历史传记不必过分地挑剔。“抑史传之作，所以记善恶也。善恶之人往矣，而必书者，所以备法戒也。今日某善也，其善事可为法则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今日某恶也，其恶事可为戒则戒之已矣，不必其恶果出于某也。是故真与伪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从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庄列之寓言、稗官小说所称道，则亦庶乎其不可废矣。”^[25]这一看法是比较圆通的。明代不少传记，就很难分辨其是历史还是文学。撰写人物传记时，作家按现实真实进行描绘，历史家在一些细节上有点虚构，都是可以的。

这样，我们在正视历史与文学的分别时，不可抹煞两者存在交汇点。不能因为承认了某著作是历史，就否定它同时也可能是

文学或其中有部分是文学；也不能因为某著作中有些可以算作文学，就把整部著作都列为文学，否定它的基本性质是历史。

上面所谈到的《左传》《战国策》《史记》等著作，整体上应当说是属于历史，它们大量地是采用简略的叙述，大段的记言。真正的细节描写是不多的。并非写了人物就是形象塑造，有了故事情节就是细节，具体的叙述就是细节描绘。其中只有少数的篇章，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所选的，放在它们的写作年代，即文学刚起步的年代来看，大体可以算作文学作品，其余就不多了。笼统地说它们是文学作品，甚至说它们不是标准的历史而是真正的文学，那是言过其实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仅没有划清、反而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线。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注：

- [1] 亚里斯多德《诗学》，《西方文论选》上册，第64-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 [2] 钦提奥《论传奇体叙事诗》，《西方文论选》上册第186页。
- [3] 莱辛《汉堡剧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册75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 [4] 巴尔扎克《〈人间悲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册，第173页。
- [5] 高尔基《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西方文论选》上册第709页。
- [6] 高尔基《致瓦·吉·李亚浩夫斯基》同上书第709页。
- [7] 高尔基《给谢·米·契夫金》同上书710页。
- [8] 《中国文学讲话·史学概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
- [9] 《读第五才子书法》。
- [10] 《史通·杂说上》。
- [11] 见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第56-57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8月版。
- [12] 近·丘炜萱《客云庐小说话》卷五，见《中国近代文论类编》第91页，黄山书